

專號導言——國王已死，國王萬歲*

陳正國**

君主制度是人類自有文字以來，存在最爲長久的政治體制。直到今天，君主不只仍具體存在於某些國家的政治體制之中，有關君主的意識與語彙，依然普遍存在於許多社會的日常生活裡。人類文明其實也多孕生於此一體制的羽翼之下。因此史學以君主及其相關的題材爲研究對象，毋寧是極自然的事。可是這半世紀以來英語與漢語世界裡，有關君王的研究並不似想像中之多。此中最重要的轉折，在於五〇年代以後，經濟史與社會史的抬頭乃至壯大。經濟社會史家們認爲，歷史的真相與動力來自社會的底層而非精英，更遑論君王；標榜人民的歷史寫作，自然盡量避免向人民的對立面——君主——表示過

*本期專號的產生肇始於兩件事由的湊合。其一是明年六月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將以王權爲主題，舉辦第三屆世界史經典研習營活動。其二是本期中陳秀鳳教授的王權文章已於去年通過刊登。主編黃先生與編輯群於是決定依王權爲主題策劃專號，如此或可作爲此間史學社群王權研究的新里程碑，亦可讓明年研習活動的參與者能有及時的文獻可以參考閱讀。因為專號計畫而讓陳教授文章拖延至今才得付梓，請求見諒。其他作者於編輯過程中所表現的擔待與配合，在此一併謝忱。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度的關心。英語世界似乎在二十世紀五〇年代之前曾出現一波對君主研究的熱烈氣氛，但在六〇年代狂飆的社會氣氛中逐漸沉寂下來；取而代之者，則是許多厚重扎實的經濟社會史。近一、二十年英語界有股重返君王論的現象，主要因素也與社會經濟史的相對退潮有關。

許多古文明的歷史書寫的初韌都以政治權威或君主為核心。一般而言，歷史書寫成熟於社會進入人類學家所說的「複雜社會」之後；定居生活型態造成城邦或國家體制的出現。大規模的戰爭(例如史上著名，亦即死傷慘重的長平之戰與特洛伊戰爭)與能夠支配領土權的政治權威的取得，成為歷史裡明顯甚至頻繁的現象。因此，史書的載記首重於戰爭英雄與政治權威者。傳統政治史寫作在東西方傳統裡均源遠流長。例如司馬遷(西元前 145-前 86)《史記·本紀》與普魯塔奇(Plutarch, 約 46-127)的 *Lives* 裡對政治及軍事領袖的描述，均對後代的君主研究產生巨大影響。西方從十六世紀以來，因為諸般複雜的社會經濟因素，逐漸造成城邦生活的復甦與活躍。中世紀政權與教權之間一直存在著緊張的平衡。「現代」初露之後，該天平逐漸向世俗政權傾斜。人們的注意力也逐漸從上帝之城，轉到地面上的君主城邦。可以想見，政治史與君王論述此時又成為歷史書寫的重點。馬基維利(Nicolas Machiavelli, 1469-1527)的《佛羅倫斯史》與《君王論》其實可以合觀，併視為現代政治史的典範——同時標榜公民主義與君王統治的重要。另一方面，普魯塔奇與塔西佗(Tacitus, 約 56-120)的 *The Annals* 對政治人格的描述傳統在十八世紀一樣後繼有人。某些評論家——例如梁啟超(1873-1929)認為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的《路易十四的時代》係文化史的先導。其實伏爾泰此作係政治人格、時代發展與文人自我意識交纏結合的作品。十八世紀史學對歷史人物的人格特質，尤其是政治人格的描述在大衛·休姆(David Hume, 1711-1776)的《英格蘭史》裡表現地更為突出。相較於十九世紀如基佐(Guizot, 1787-1874)、麥考萊(Thomas Macaulay,

1800-1859)、巴克爾(Henry Buckle, 1821-1862)等人的議會主義政治史寫作，休姆極有意識地將君王的政治人格看成攸關社會文化隆替的重要因素。

十九世紀的輝格或議會主義史學不再標舉君王而以中產階級的進步主義解釋政治、法律與社會的歷史；此時君主雖然仍舊是傳記寫作的重要對象，卻不再是歷史的主角。但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西方史學似乎重新對君主議題感到興趣。此中緣由值得留待史學史專家仔細研究。粗略觀察，此一時期君王研究的視角相當廣泛而深刻。其中一種視角環繞著君主制度的「現代性」而展開——論述現代國家的興起，以及封建社會的崩解以及國家與教會的權力消長。在現代早期，國家與王權一起並肩成長，至「開明專制」(Absolutism)時期達到巔峰；而在美國革命與法國大革命之後開始轉向，甚至逆轉；終至人民主權的出現與確立。因此研究「現代」不可避免地需要深入討論君主制度(monarchy)。此種研究內容，從王室的外交政策到君主制度所代表的世界觀及其與基督教宇宙觀之間衝突等等不一而足。¹另有一種視角係以法律史的觀點探討君權的正當性或王權的再現問題。例如康托洛維奇(Ernst Kantorowicz, 1895-1963)出版於一九五七年的名著 *The King's Two Bodies*，是從法律史角度討論王權統治正當性的著作。²著名的法律社會學者韋伯(Max Weber, 1864-1920)提出，文明社會的支配(統治)正當性來自於三個面向：理性、傳統、領袖魅力(charisma，或譯奇力斯瑪)。³這三

¹A. M. Hocart, *Kingship* (London: Watts, 1941); Henri Frankfort, *Kingships and the God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48). 本文中所列舉書目，旨在舉例提示；絕無意宣稱窮盡相關文獻。

²有論者以為本書對「國王雙體」這一「神話式」的法學語言的批評，顯然係針對 Carl Schmitt 的政治神學理論而發。此說洵為正論。

³韋伯(Max Weber)著，康樂等譯，《支配的類型》(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

種面向或類型的提出，只是方便概念上的操作，因為多數實際統治都同時混合了這三種類型。不管如何，韋伯的類型學對史學史的爬梳有一定的助益。我們大概可以說，八〇年代之前的王權研究主要著重於討論理性與傳統正當性這兩個面向；而八〇年代之後的研究則有強調領袖魅力塑造的趨向。當代文化史有關國王或王權的寫作，顯然偏重韋伯所說的領袖魅力層次。論述的重點在於談論從文藝復興至巴洛克時期的宮廷文化，如何有意識地塑造宮廷以及國王的權威與神聖。視覺文化與印刷文化等題材在這近三十年成為西方史學研究的重點，使得關於統治者形象塑造的研究更加地得心應手。文化史的研究或者強調(自我)塑造的行動意義(making 或 self-fashioning)，或者強調統治(者)形象的社會傳佈與編造(fabrication)。⁴

雖說六〇年代前後的社會經濟史研究造成政治史與王權研究的相對萎縮，但說來有趣，以創辦《經濟暨社會史年鑑》而為法國開啓社會經濟史風潮的布洛克(Marc Bloch, 1886-1944)卻也是早期對王權研究獨具慧眼的傑出史家。布洛克在世時發表了 *Kings and Serfs* (1920)以及 *Magic Working Kings* (1924)。⁵作為傑出的社會史家，布洛克為何要研究國王？至今殘存的中古史料多數有關君王及上層政治。但此種「史

份有限公司，1989)。

⁴Thomas Corns (ed.), *The Royal Image: Presentations of Charles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David Howarth, *Images of Rule* (Londo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eter Burk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⁵現今 *Magic Working Kings* 的通行英文翻譯標題為 *The Royal Touch: Monarchy and Miracles in France and England*, tr. A. E. Anderson (New York: Dorset Press, 1961)。原法文書名則為 *Les Rois thaumaturges: etude sur le caractère surnaturel attribué à la puissance royale particulièrement en France et en Angleterre*.

料論」顯然不足以完全說明這個史學史問題。比較合理的說法應該是，若不討論王權，中世紀的歷史就必然無法得其全豹。不論是從制度、法律或傳說、口語文化各方面來看，國王都是中世紀人們生活裡不可割離的一部分。只有深刻了解人民與國王之間，實際權力的互動與價值系統、想像的關係等等，史家才能掌握中世紀人們的社會態度。相較於康托洛維奇，布洛克的目的不在於批判英法相信國王的身體有神聖性以及治療癲瘋的療效等神秘信念。其實布洛克正是希望藉由這個獨特的信仰，讓早已接受科學革命與政治革命的現代人，體會到中世紀世界獨特的「感情型態」與「信仰型態」。布洛克的名著《封建社會》(1939)裡的一些精采通論，以及他著名的「心態史」取徑與這些君主研究其實息息相關。如果注重主體塑造論述與身體歷史的當代史學在布洛克著作發現親密淵源與靈感，固然是可喜之事，倒不一定是布洛克的原意。

相較於當代的文化史風流，本期三篇西洋史論著的研究趣味顯得比較「古典」。三篇文章均著重在探索王權的統治合法性議題，只是論述的重點因其時間與空間的差異而明顯有異。陳秀鳳〈政權「神聖化」〉一文討論國王加冕儀式中的祝聖禮的產生、確立及其影響。作者強調政權與宗教之間的互動，尤其是宗教的儀式與神聖性如何強化世俗政權的統治正當性。如果用韋伯的說法，這是指宗教大傳統如何幫助國王建立統治正當性的依據。作者強調，祝聖禮是法蘭西(西歐)王權的東方化的現象，其結果是「擴大了國王權力具象化的極限」。教權為政權增權，成為中世紀法蘭西國王權力的基礎之一。近年討論宗教大傳統如何幫助政權取得統治正當性的著作頗有可觀；⁶〈政權

⁶ 例如 Joseph H. Lynch, *Christianizing Kingship: Ritual Sponsorship in Anglo-Saxon Englan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神聖化」)貼近這個議題而且與近來文化史注重視覺材料的取徑有直接關係。相較之下劉慧〈十三世紀中期的英格蘭王權〉一文就更為古典。該文巧妙的以一二五八年的一場政變及其後續發展,討論英格蘭史上的重要文獻《大憲章》的法理與實際政治(realpolitik)之間的關係。作者對檔案做了細緻研究之後發現,儘管英國貴族在《大憲章》背景下積極宣稱他們的權力,甚至透過十五人會議形式執行許多原屬國王(亨利三世)所轄握的行政權,但他們終究不能替國王代決所有文書。換言之,國王的確擁有一些在封建法規下獨享的統治權;如特赦權與特許權。從貴族擴權的侷限,〈十三世紀中期的英格蘭王權〉描述了封建王權的本質。劉文結論道,真正能限制王權的體制,需要等待議會的崛起才有可能。林美香〈一個王國中的兩位女人〉一文討論都鐸朝四份重要文獻對女主統治的正當性論述;屬於精細的文獻詮釋。根據作者的意見,這些有關統治正當性的討論跨越了法律與宗教的範疇,隱然希望在女主相繼出現的都鐸朝,確立女性統治的「自然現象」。但弔詭的是,這些正當性論述並不受實質政治權力的擁有者,如伊麗莎白一世的青睞。換句話說,王權正當性論述並不永遠是王權塑造的首要之務。西方王權在中古晚期與近代早期出現了重大變化。一方面王權的憲政意涵逐漸明朗而集中,甚至逐漸被認知為國家主權的代表。但另一方面它漸漸被要求直接面對、甚至釐清與議會或人民的關係。本期三篇文章分別展現王權長期演化過程中三個重要面向與歷史時刻。

中國帝制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如果加上周天子與三皇五帝的歷史記憶,皇權的概念異常豐富而深遠。漢語世界的王權研究雖然未若西學發達,卻也不絕如縷。大體而言,臺灣與早年海外華人的王(君)權研究泰半由制度史入手,再輔以思想史的疏通。制度史原本就是近半世紀臺灣史學的瑰寶;邢義田〈中國皇帝制度的建立與發展〉是在這

個傳統上討論皇帝與皇權的經典文章。⁷更早之前，余英時〈「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一文雖非出自臺灣制度史規範，而是以社會學的官僚體制觀念，輔以思想史的詮釋談論中國王權的擴張本質，但此種論述風格卻很能與臺灣史學發生共鳴。⁸本期兩篇中國史文章都針對秦漢變革下的「皇權」與「帝制」而發。王健文〈帝國秩序與族群想像——帝制中國初期的華夏意識〉依然是承續臺灣制度史研究的大傳統。只是該作者有意識地加入當代對民族國家與文明化的論述面向，重新敘述秦帝國的建立。王健文認為，秦帝國建立實為東亞地區開天闢地的第一等大事，而它真正所表示的意涵，是在無土不被的帝制下進行文明化與文化認同並進的鉅大工程。甘懷真〈秦漢的「天下」政體——以郊祀禮改革為中心〉一文是具有史學史意識的文章。該文希望走出皇權 vs. 相權或官僚體制的傳統研究進路，而從宗教面向探論皇權與人民之間的詮釋學意義。這樣的進路其實很接近秦家懿(Julia Ching)幾年前所出版的王權研究。⁹不過相較於秦書縱論一千多年儒家

⁷邢義田，〈中國皇帝制度的建立與發展〉，《秦漢史》(臺北：三民書局，1987)，頁43-84。邢教授面告，源於近二十年新出土文獻的研究，吾人實已能夠進一步深化或商榷該文某些論點。可惜國內與海外似尚無人投入此一工作。

⁸余英時，〈「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收入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頁47-75。幾乎與此同時，史學大家錢穆發表他對中國君權、相權關係的不同見解。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77)，頁9-13。徐復觀則提出對錢穆觀點的再商榷，參見〈漢代一人專制政治下的官制演變〉，收入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一》(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頁203-280。從某個意義上說，徐文也是從官僚體制的角度闡釋中國王權。

⁹Julia Ching, *Mysticism and Kingship in China: The Heart of Chinese Wisdo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秦教授探討了中國王權的宗教性、聖王概念、宇宙論、天下、歷史意識的建構。

的王權思想，甘文則強調秦帝國建立所展現的政治史意義：「宗教的系統」的天下觀念，如何使得「天下一家」成爲可能。透過祭祀禮儀，君主(皇帝)與人民之間的統治關係得到新的理解——忠與孝可以在國與家之間相互轉換。上述兩篇文章均希望借助史料以外的思想資源，以豐富王權的研究；也都透露出概念化其研究對象的企圖。

中國大陸史學界近年來慢慢改變了長期對王權議題冷漠的態度。王權研究專論相繼出版，雖尚稱不上熱絡，但已非熱中「向工農兵學習」的時代所能想像。這些著作的出版，或許表示君權已經重新回到中國史學社群的歷史意識裡了。¹⁰不過歷史意識的調整或轉變畢竟非一朝一夕間事；例如張分田《中國帝王觀念》一書有許多一般性的泛論與斷語，而蕭國亮《皇權與中國社會經濟》中許多論點明顯地陷在庸俗馬克思主義的框架裡。¹¹如何進行細緻的王權研究，應該會是中國史家下一步思考的重點。相較於中國大陸這十多年來「重新發現傳統」的熱誠，與此同時，臺灣有關中國王權的研究則顯得沉默。本專號兩位作者都是花比較多心思在此議題上的壯年學者。¹²中國政治制度既然以君權爲核心，擅長中國制度史的臺灣學界應該最有能力深化相關課題。例如有關「內廷」與「外朝」的研究已經有相當時日。如何以文化史的角度來豐富傳統的內廷與外朝之分別，應該就是件極有意義的工作。而如何透過文化史取徑而掌握的新研究，回饋或接枝

¹⁰張分田，《中國帝王觀念：社會普遍意識中的“尊君——罪君”文化範式》(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周良宵，《皇帝與皇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感謝邢義田先生告知周書。邢先生詳細閱讀本文，並提出中肯批評；筆者受惠匪淺。謹此申謝。

¹¹蕭國亮，《皇權與中國社會經濟》(北京：新華出版社，1991)。

¹²王健文，《奉天承運》(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甘懷真，《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臺北：西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2003)。

於早期的政治史研究，俾使政治史更具多面性與豐富性，應該更是值得嘗試的工作。西方近年對宮廷文化的研究，大量取徑於物質文化的相關議題；既強調視覺藝術對王公貴胄自我再現的諸般流行，也強調藝術工業裡所浮現的王室與社會之間的權力互動。¹³中國史文獻裡的視覺材料相對有限，因此相關的王權研究或許不能亦步亦趨於西學的文化史寫作。¹⁴不過有些新一代科學史家依然相信，透過西方學術的啓發，能更有意識地將科學史議題放在宮廷社會文化來研究。¹⁵除了宮廷文化，中國皇權與王權的區分，本身就是極為複雜(因此豐富)的歷史。「王」不只是政治領袖；在道德論述中，「王」也常常代表至高的政治人格——如「王」與「霸」的分別。而「皇」則是一種無上，代表普遍意涵的統治者。二者的區別，是否值得經過這幾十年史學進化的學術社群重新審視疏通？我們是否能說「王」對應於封建，而「皇」

¹³Mary Hollingsworth, *Patronage in Renaissance Italy* (London: John Murray, 1994); 愛麗蓀·柯爾(Alison Cole)著，黃佩玲譯，《義大利文藝復興的宮廷藝術》(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John Paoletti & Gary Radke, *Art, Power and Patronage in Renaissance Italy*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2005); Bruce Moran (ed.), *Patronage and Instituti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at the European Court, 1500-1750* (Rochester: Boydell Brewer Inc, 1991).

¹⁴比較接近以西方文化史訓練從事中國王權相關研究者，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王正華教授。

¹⁵Pingyi Chu, "Scientific Dispute in the Imperial Court: The 1644 Calendar Case," *Chinese Science*, 14 (1997), pp. 7-34. 感謝祝平一先生面告他的文章「暗地裡」受惠於 Norbert Elias 的 *Court Society* 一書。Elias 以社會學角度詮釋宮廷文化的努力始於他的成名作《文明的歷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N. Elias, *The Civilizing Process*, tr. E. Jephcott (Oxford: Blackwell, 1994); *The Court Society*, tr. E. Jephcott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3). 此外 Elias 以反抗宮廷文化來「解釋」莫札特的「死」。N. Elias, *Portrait of a Genius*, tr. E. Jephcott (Cambridge: Polity, 1993).

對應於統一？戰國時代的諸「王」爭霸的王權有何歷史上的特殊性？此外，跨文化的王權研究顯然也值得注意。此處所謂跨文化不專指人類學或社會學式的比較研究，儘管這類研究的本身極有價值。此處所言，是指文化交流中的不同政治社會對彼此的王權的不同理解。西班牙與荷蘭人如何理解中國(或日本)的王權？英國人在朝貢經濟中是否體察到中國社會的皇權，有別於他們主權國家架構下的「喬治三世」或維多利亞「女皇」？清末五大臣出使歐洲後回來倡議君主立憲，是否表示他們誤以為中國皇權也只是主權(sovereign)問題而已？君王或皇帝經常扮演最重要的文化贊助者或消費者的角色，因此中國社會裡的精緻文明必然在相當程度上型塑於皇權影響之下。另一方面，民間意識與傳說(例如龍意識與三太子傳說等等)也經常反映出中國皇權的烙印。以此角度來看，那麼中國近代政治革命的文化意義為何？中國的政治革命有無一個「文化的起因」？這些或許也是值得發微或深論的課題。

自從馬克思提出上層結構與下層結構的二分法之後，許多史家似乎太早放棄了上層結構對歷史的進程具有「決定性」影響力的想法。如何「歷史地」重新審視「上層」，應該是極具挑戰意義與重要的學術課題。傅科(Michel Foucault, 1926-1984)認為人類的文化建置裡處處含藏著權力運作的關係。如果傅科的後啟蒙觀點有其洞識，那麼，或許所有的歷史都可以稱之為政治史。只是新政治史的寫作，應該會是再次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重新體認。早在六〇年代末，西方王權或政治史研究就已經表現出寬廣的格局與觸角。¹⁶而近年關於王權的專書則明

¹⁶John C. Rule, *Louis XIV and the Craft of Kingship*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8). 茲列舉其章節名稱以示意：1. Louis XIV, Roi-Bureaucrate; 2. The formation of a king; 3. The medical history of Louis XIV; 4. Louis XIV and his fellow monarchs; 5. Louis XIV, soldier king; 6. law and justice under Louis XIV; 7. Louis XIV and the church; 8. The court and

顯企圖將邇來文化史與敘述史學的研究特色摻揉進來。¹⁷Kevin Sharpe 的 *The Personal Rule of Charles I* 成書耗時十年以上，卷帙超過千頁。¹⁸該書以英格蘭王兼蘇格蘭王 Charles I 的個人歷史為綱，細緻地描述了與他相關的英國政治史、生活史、文化史、軍事史。臺灣史學一度標舉的上窮碧落下黃泉的尋找一手史料功夫，在本書中顯露無遺。稱此書為查理一世全史，庶幾無愧。近來人們喜談的「微歷史」、「文化史」、「視覺史」等等，對此書而言都顯得其次。法國著名的文化史家 Daniel Roche 最近被訪問時表示，〔法國〕史家應該更嚴肅思考政治史的寫作。他說：「你如何教授十八世紀歐洲史而不從政治制度如法國君主制、英國議會君主制、帝國等等入手？」¹⁹我們相信，臺灣史學社群終會發現，政治史雖已死，政治史依然長存。而這一天，或許距今不會太遠。

capital of Louis XIV: some definitions and reflections; 9. Myth and politics: Versailles and the fountain of Latona; 10. Louis XIV and absolutism; 11. Some problems in tracing 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Louis XIV from 1661-1715.

¹⁷Wim Blockmans, *Emperor Charles V 1500-1558* tr. I. van den Hoven-Verdeon (London: Arnold, 2002).

¹⁸Kevin Sharpe, *Criticism and Compliment: The Politics of Literature in the England of Charles I*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The Personal Rule of Charles I*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¹⁹Maria L. G. Pallares-Burke, *The New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2002), pp. 124-125.